

宕昌县志办公室主编

宕昌民族研究

杨海帆 著

- 古遗址及古墓葬
- 唐宋时期宕昌羌人
- 民族宗教
- 民族语言及其它
- 天葬





民族考察

组成人员

杨海帆 杨和安

赵作忠 王小英

赵文海 王晓凤

杨晓娥 者淑芳

为什么写这本书

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弄清宕昌县的民族问题。

说到民族问题，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面广，文化纵深层既有历史的，又有现状的，要研究清楚一个民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宕昌县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中，那些是狩猎民族？那些是游牧民族？那些是农耕文化为思想体系的民族？那些是草原文化为思想体系的民族？很难界定的。在古代，宕昌有羌人民族集团，在现代，又有汉人民族和藏人民族，尚有一些外来民族，泛多十几类了。那么就汉藏民族之间有没有内在关系？羌藏之间又有没有内在关系？等等。需要 we 进行长时期的研究、分析，找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合部，或许也就能找到民族的源头了。

近几年，随着宕昌旅游业的蓬勃兴起，从中牵扯到一些民族问题，那就是现在生活在宕昌的藏族，他们是否就是历史上的羌族？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区内，为了发展当地少数民族经济，需要打造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氛围，形成一种民族气息比较浓厚的文化事业的旅游亮点，将自然的和人文的有机的结合起来，使纯自然的文化遗产注入一种人文文化的灵动感，这样的旅游业才是比较完整的旅游业。然而，就在打造民族文化旅游的过程中，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在羌与藏之间不希望出现一个让人头痛的分水岭。这个问题，在藏区群众中表现尤为突出。

作为一个决策者，不论是羌，还是藏，他们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千方百计期望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们，通过

森林公园旅游热来拉动他们的经济收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基点、为出发点、为最终的追求,应该得到宽谅和理解!

一个民族的形成,它本身就具有一定历史性,在特定历史阶段,作为狩猎民族出现的时候,这个民族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源起民族。就全球而言,一些大宗性的民族没有不经过狩猎生活的,这个狩猎便成了人们的共同经济,在同一地域上表现出的同一语言、同一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但是,这种源起民族又是很不稳定的,它是可变的、可分化的。诸如走过漫长的狩猎生活之后,一部分走向了游牧生活,成了游牧民族;一部分人走向了农耕文化,成了农耕文化的民族,这些民族都还是具有源起民族性质的不稳定民族。

你比如就藏族的源起民族是吐蕃,而吐蕃的源起民族却是古代的发羌。反过来看,由发羌形成吐蕃,由吐蕃形成现在的藏族,所以说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是没有的,这里没有分水岭。

就宕昌而言,我们的先祖同样走过了狩猎生活、游牧生活、农耕生活的历史阶段,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民族也是经历了一种发展变化,最终达到稳定性的一个民族,那就是现在众多人口的汉族。我们现在看到的汉族共同体,在源起上经历了土著民族阶段、羌族集团阶段和汉族阶段。如果把羌族作为宕昌的源起民族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的80%人口都是从事农耕文化的民族,这一形式是这一民族的共同经济形式;从中也有20%的人口是从事游牧文化的民族,但它不是另类民族,同样是早期的羌人,是农耕文化的一个分支,而最终没有形成草原文化,在共同经济生活上成为农耕文化的不可分离的一个群体。宕昌羌人到了汉代,尤其在东汉时期,大量人口流散到西南地区,人口减少得很厉害,一直到了宋代,加速了宕昌羌人汉族化的历史进程,使70%左右的羌族人汉族化。宋代,是宕昌羌族汉族化的一个最大的结合部。这是历史,这是事实。在宕昌广大地区,虽然是一个汉族化的稳

定性极强的人们共同体,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还保留着原始民族——羌族的风俗习惯,如羌人崇拜的凤凰山神,基本上普及全县;又如羌人有人歿世之后,男子不戴头孝,只戴腰孝,在宕昌县的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等等。所以,我认为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是不存在的。

为了弄清楚宕昌县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宕昌县的主要领导同志曾经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们县志办不但要搞好县志的编写工作,而且更重要的要搞清楚宕昌县的民族问题。能不能将羌族问题来一个彻底调查,最后实现民族自治县,这样,对宕昌人民有好处。

这个担子不轻,但不能不担。2005年我们组建了民族研究室,组织了富有一定经验的同志,历时多半年时间,就民族问题在宕昌县进行了全方位的考查。尤其对西南山区地带的藏族进行了重点考查,从共同语言上、共同地域上、共同经济生活上、共同文化上、共同心理素质上进行了多层面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西南山地地带的藏民族群体来源有二:一是迭部县的达拉一带;二是舟曲县的憨班、九源、好梯坪一带。他们的源起民族状况是:来自迭部的群体民族源头是烧当羌、党项羌;来自舟曲的群体民族源头是参狼羌。表现在考古文化上,生活在不同地域却出土了相同文物的考古文化;表现在语言上,他们说的藏语和西藏拉萨藏语一句也不能交流等等。

因此我说,宕昌县的汉族前身是羌族;宕昌县的藏族前身,还是羌族,汉藏群体皆为羌族的后裔。当然,这里不包括宋朝以来不断流入的真正意义上的汉族人口。

能指明这一点,这便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最初想法。要出现争论,那是学术上的事情,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作者

2006.1.6

目 次

为什么写这本书	1
古遗址分布	1
宕昌羌人葬俗	11
宕昌国时期的宕昌羌人	24
宕昌将台乡党项羌人的世居地	31
宋金时期的宕昌羌人	40
茶马市及定编军队对宕昌民族的影响	45
羌民族分布及语言分析	52
番俗	63
羌族人到哪里去了	69
羌居	74
现在藏族属类分析	78
任藏藏族天葬调查	88
民族宗教	91
凤鸟	99
宕昌藏区考古文化带分布	178
民族语言面临的问题	182
羌藏民族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189
最后的思考	191
编后记	195

古遗址分布

宕昌县位于甘肃省南部,陇南市西北部,白龙江上游,岷江之滨,地处东经 $104^{\circ}1'$ 至 $104^{\circ}48'$, 北纬 $33^{\circ}46'$ 至 $34^{\circ}21'$ 之间,海拔 1138 米至 2500 米之间,南北长 90 公里,东西宽 74 公里,总面积 3331 平方公里,东与礼县接壤,西与甘南州舟曲、迭部相邻,南与武都毗邻,北与岷县相连。县城距首都北京 2134 公里,距省会兰州市 341 公里,距陇南市武都地 110 公里,距礼县县城 68 公里,距舟曲县城 68 公里,距迭部县城 219 公里,距岷县城 73 公里。

宕昌一度为岷州属地,面山带河,形势险阻,西通青海之塞,南临白马之氏;内则屏藩蜀门,外则控制番境,商周时期尚不入版图。自秦汉以迄元明,废置纷纭,初无定制。据出土文物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此繁衍生息,白龙江流域、岷江流域、西汉水流域的黄土台地中,发现古人类文化遗址 36 处,其中仰韶文化 1 处,马家窑文化 7 处,齐家文化 24 处,寺洼文化 4 处,沿岷江流域河谷地带的台地上尚有甘江头乡骆驼下村的火烧坪遗址,占地 1.4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瓶、灰陶罐、石刀数件,属仰韶文化遗址。城关镇牙坪村牙

坪遗址,占地2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盆、红陶钵、灰陶罐、石刀等器皿,属马家窑文化遗址。城关镇旧城村大坪遗址,占地6.4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盆、红陶罐、灰陶罐、石刀、骨刀等器皿,属马家窑文化遗址。

临江乡蔡江头蔡江头遗址,占地2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盆、红陶罐、灰陶罐、石刀、骨针等器皿,属马家窑文化遗址。

何家铺乡大堡子村黄大坪遗址占地7.5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等器皿,属齐家文化遗址。何家铺大堡子苟家坪遗址占地3.5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盆、灰陶罐、石斧,属齐家文化遗址。

新城子乡老树川庙坪遗址占地0.75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罐、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址。城关镇人民街秋秋嘴遗址占地2.25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斧,属齐家文化遗址。城关镇石磊村高庙山遗址占地8万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叠压相当厉害的彩陶片、红陶片以及比较完整的红陶盆、灰陶罐、石刀、骨针器皿,属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交汇地带。城关镇红光、光明村县城遗址占地10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片、红陶盆、灰陶罐、石斧,属齐家文化遗址。城关镇红光村辛沟遗址占地6万平方米,



出土了彩陶盆、红陶盆、灰陶罐、石斧,属齐家文化遗址。城关镇同盟村半山遗址占地 2.4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址。城关镇玉地山村玉地山遗址占地 2.5 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盆、红陶盆、灰陶罐、石凿刀,属齐家文化遗址。城关镇玉地河村庄廓地遗址占地 0.8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址。

临江乡白杨坝村烽火台遗址,占地 1.3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钵、灰陶罐、石刮削器,属齐家文化遗址。

临江乡白杨坝村堡子崖遗址,占地 6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址。

甘江头乡临江河村临江河遗址占地 5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址。该乡谢家坝村花家坪遗址占地 2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址。

城关镇红光村皮透山遗址,占地 0.3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罐、灰陶豆,属寺洼文化遗址。城关镇光明村斜坡遗址,占地 0.76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罐、灰陶罐、石刀,属寺洼文化遗址。

新城子乡林家坪遗址占地 3 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盆、红陶罐、灰陶罐、石刀,属马家窑文化遗址。

南河乡前贯村前贯坪遗址,占地 6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壶、灰陶罐,其中有高达 1.5 米的灰陶罐 10 件,属齐家文化遗址。

西汉水流域:

南阳镇吴家村坪后里遗址,占地 3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址。

韩院乡庙底村庙底村遗址占地 0.6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址。

白龙江流域:

沙湾村沙坝村沙坝遗址占地 10.8 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盆、红陶罐、灰陶罐、石刀、骨笄,属马家窑文化遗址。该镇寺上村寺上坪遗址,占地 1.62 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盆、红陶罐、灰陶罐、石纺轮,属马家窑文化遗址。该镇董家坪村董家坪遗址,占地 6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石斧,属齐家文化遗址。该镇长塆山遗址占地 0.6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罐、灰陶罐,属寺洼文化遗址。

桓水流域:

牛家乡哈柱山村哈柱山遗址占地 8 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瓶、红陶罐、灰陶罐、石笄、鹿角,属马家窑文化遗址。

阿坞乡西迭村瓦厂沟遗址占地 1.5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罐、灰陶罐、石刮削器,属寺洼文化遗址。

理川镇下街村转转山遗址占地 7.8 万平方米,出土了彩陶盆、红陶罐、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址。该镇上街村瓦家山遗址占地 6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址。该镇蔡家村歪那旁遗址,占地 1.25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罐、灰陶盆、石刮削器,属齐家文化遗址。

牛家乡牛家村郭家壕遗址占地 1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瓶、灰陶罐,属齐家文化遗址。

红河流域:

将台乡杨家村杨家遗址,占地 1.2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斧,属齐家文化遗址。该乡罗家村罗家遗址,占地 1.4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盆、灰陶罐、石刀,属齐家文化遗

址。该乡曾家山村蒋家坡遗址,占地 1.6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壶、灰陶罐、石斧,属齐家文化遗址。

簸箕河流域:

贾河乡簸箕村簸箕遗址,占地 2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壶、红陶瓶、红陶罐、骨针,属齐家文化遗址。

贾河流域:

贾河村梅家村梅家坪遗址,占地 5 万平方米,出土了红陶瓶、灰陶罐,属齐家文化遗址。

以上诸多遗址的分布,基本上涵盖了宕昌全境。而且在恒水流域的墓葬中出土了些许石英石陪葬品,也有白中闪红的石英石,这些迹象表明,皆为古羌人的石崇拜铁证。

宕昌古羌人的存在,从新石器时代乃至当代,经历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书虽称:“宕昌羌,其先盖三苗之裔,”就其宕昌羌人的先祖,盖出于三苗,史书说得有些过于绝对化。这里不排除宕昌羌人有古苗人的血统,但这血统不是散见于各部族,只有某些羌人中有血亲关系,这是因为西戎作为羌人的古部族,早已存在,三苗徒三危变西戎,变者,融变之意,而不是西戎羌是由三苗变化而来的,宕昌羌也当是庞大的西戎羌中的一个分支。据《尚书·禹贡》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玁。”宋蔡沈《集传》:“三国皆贡衣,故以织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总之。”西戎羌可能以羊为图腾的,“羊,火畜也。”而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炎帝姜姓,是羌人的领袖,号烈山氏,以火德王,以火名官;羊,火畜,炎帝和羊的关系甚密。但炎帝又以农而司天下,教万民司农而谷,以农为主,就西北地区,在炎帝存在的时代,牧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宕昌羌人同样以牧业和农

业同时兼营。诸如宕昌县官亭镇三盘子沟出土的谷种,甘江头赵家沟古洞出土的谷物种籽等,这些谷物均装在红陶罐中,上覆以石片,埋入灰层进行保护,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时期,谷物初看尚好,手触之即粉。这就告诉我们,宕昌羌人的先民们,在炎帝时代早已开始了农耕文化的传播。

在很多古遗址中,相继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凿、古铤、石刀、石锄、骨针、玉铲、玉璧、玉琮、玉璜、形似石斧的累石等等器物,这些文化现象的遗存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宕昌羌人的先祖们,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进入了比较先进的农耕时代,随着农牧业的发展,宕昌羌人处有定所,耕有其田,养有家畜的综合性农耕文化的文明时段。如岷江流域、西汉水流域、白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从文化层中暴露出来的古人类居住的屋基,这些屋基大多呈山地洞穴式,开口为洞,洞阔数丈余,屋呈方形,地坪均用白灰铺垫夯筑,从断面上看,厚有五厘米,断茬洁白,铺垫非常均匀,既可以固屋,又可以防潮。《魏书·宕昌传》云:“宕昌羌,世居屋宇,其上用牦牛尾覆之。”这又是一种屋形,这种屋形从山地洞穴式改变成了地表式,人类定而不游,不等于不牧。牧者选其草场,散牧野宿为主。畜者,以猪羊为主,从古遗址灰层中常常有很多猪骨头、羊骨头出现,谷肉兼食,酒亦随之。在何家铺乡缸沟阳坡上出土了一件高达1.3米红陶大罐淋酒罐,外表光素无纹,内有用硬器拍打坚实的压印痕,尚有灰陶哑酒罐随葬品的出土,这些均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宕昌羌人开始了农耕文化并且已经很发达了,食而谷肉,享以酒乐,这个民族已经不是一个落后的民族了。

在房屋建筑上,从山地洞穴式、半地表式到完全地表式

的过程,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时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宕昌古羌人就已经开始建筑羌人特有的板屋了。如甘江头乡的通背口村通背口古遗址中,一次就出土了石累石十四把,形如小石斧。2004年城关镇玉地山玉地遗址,一次就出土了三十几把楔石,据考古学家们认定,这些形似小石斧一般的累石楔,是羌人用来劈开圆木的石楔子,俗称累石楔。至当代,农民见了这种石楔,称累石,他们不知道累石之“累”,认为是“雷石”,是天上打雷掉下来的石楔子,累者,在一根圆木上直线形累累而进,累进而劈,直到将非常粗大的圆木劈成很厚的板状为止,然后用木板垒造成一种板屋,其上覆以芨芨草或毛类织品。由此可知,甘江头乡通背口遗址、玉地山遗址出土的如此之多的累石楔,是宕昌古羌人集中劈木成板的作坊之所,直到当代,农村一些农民劈很粗大且不易劈开的木柴时,依然沿用了古法,先用斧劈开一条缝,再在开缝处一个跟一个地打入木楔,木楔由后向前移换,直到将木柴用木楔劈开为止。木,是宕昌羌人的生命;术,是宕昌羌人赖以生活的根基。采集生活离不开木,农耕生产离不开木。木伴随人类走过了几千年,因此,在宕昌羌人居住区,特别喜欢树木,为了保护树木,他们把连片的树林赠封给诸神守护,让其旺盛生长。

宕昌西北高山草甸区,是宕昌羌人的牧养区。在这些草甸区进行放牧的羌人,虽依游牧为主,但游动性不大,牧线不长,基本上在连片的草甸区活动。牧主都是暂时脱离农家,住在靠近草原边线的崖山里,选其自然山洞,定居放牧,每至浓冬,便收牧回家,一处处山洞成了自然抛弃的居所,宕昌者,能照日光的洞屋也。宕,石也。如四川的宕渠者,石峡如渠

也。这个宕昌以能照日光的洞屋取意的地名,多以一万年前的采集者和五千年来的牧养者居石洞有很大的关系。但不包括宕昌羌人所有居民的居所特征。

《魏书·宕昌传》:“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裔。”前面已经说了,宕昌羌中有三苗的血亲关系,但不能含其尽。历史地看,上古时代,炎帝带领羌人与九黎族(包括苗人)发生长期的部落间冲突。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各包括9个兄弟氏族,共81个兄弟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81人,即81个氏族酋长。神话里说,他们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耳生毛,硬如剑,头有角能触人。以猛兽为图腾,而九黎族中包括苗族在内的众多氏族部落,驱逐炎帝族,直至涿鹿,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大战,蚩尤被杀,九黎族经长期斗争后,一部分被迫退回江淮一带,一部分留在北方,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至西周仍有“黎民”之称。炎黄联盟破裂之后,两族在阪泉(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率以熊(黄帝氏徽号)、罢、貔、貅、虎为图腾的各族打败炎帝族,占领中原地区。

西戎羌部落联盟酋长炎帝羌的族人先行中原,与九黎族为中原政权问题长期争斗,后黄帝助战,杀蚩尤,时隔不久,黄帝统领中原各族,又与三苗发生争夺战。

这一主线的意义就在于三苗公开向中原地区的尧、舜、禹首领挑战,是争取充当全国部落总联盟的盟主,核心是争取入主中原的统治权问题。于是,三苗积极北上与尧舜禹相抗衡。三苗,我国古代部族名。《尚书·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斁。”《史记·五帝记》:“三苗在江淮,荆州。”则三苗在西徒以前,当在长江中游以南一带地。《尚书·大禹谟》孔疏作了集

中的串述:“《吕刑》称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逼绝,苗民无世在下,谓尧初诛三苗。《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谓舜居摄之时,投窜之也。《舜典》又云,庶绩咸熙,分北三苗,谓舜即位之事,禹率众征之,犹尚逆命。”可见,在这场斗争中历经三世,历时长久,而且斗争是极其激烈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三苗因流放至三危之后,成为宕昌羌人的先祖。那么三苗被征服之后,尧舜禹对三苗族采取的政策是什么?首先是:放逐迁徙。据《尚书·舜典》载:“……窜三苗于三危……。”这里所迁三苗主要是指三苗之君(三苗即缙云氏,号饕餮。)及其上层集团,其目的在于:使三苗之君与三苗之民分隔开来,以达到限制和削弱三苗的势力的目的。三苗放逐三危,比西戎羌部落联盟酋长炎帝争霸中原迟得多。

史称:岷山为氏羌古族的始居地。岷山山系和叠山相向分布,从白日拉吉山、营盘山、葱地山、山神爷漂、马鬃岗梁,由西北向西南延伸,直达四川境内。以上主要山峰皆在宕昌境内。又称:岷州之地是古西羌地也。《辞海》释:“炎帝……居羌水流域”,又云:“羌水发源于今甘肃岷县东西的岷江……”又据酈道元《水经注》载:“羌水东南流经宕昌城东。”酈道元所言羌水,即今宕昌的岷江,古称羌水。炎帝即以居羌水,征战中原,必有宕昌羌人之一部。

“窜三苗于三危。”放逐者为“三苗之君”和“三苗的上层集团”。君和上层集团的人数不太多,他们都是些苗族的首领,以达分而制之之目的。在三苗之君和三苗上层集团徙之三危时,宕昌羌水流域早已有人类居住。同时也包括西汉水流域和白龙江流域的古先民在内。而三苗徙三危,将三苗融入西戎羌,这是融入和通化,目的是为了瓦解其势力。

“窜三苗于三危”，三危究竟在何处？一些史家认为三危在甘肃敦煌的三危山，我曾亦随之。后经过多年的研究，三苗即以窜三危山，又何以转窜宕昌？又成为宕昌羌人的先祖？是什么原因要一徙再徙？这中间的变数是什么？史书无一提及，史学无一论及，这中间缺环较大。关于三危的地理位置，说法不一：一说在今甘肃敦煌有三危山，即古三危。见《尚书·禹贡》；一说在甘肃岷山之西南，见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尧典》；一说在云南。《山海经·西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

史书提及：窜三苗于三危，而没有说窜三苗于三危山。前者“三危”和后者“三危山”又有一定的区别。“三危”之“三”，是一个数词，“三危”之“危”是形容词，危者，高峻之意也。如庄子回子力：“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危石，即高峻的山石。据此，敦煌的三危山有实指，是山名，不合“三危”之意；云南“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亦即山名也，并有青鸟而居之，亦不合“三危”之本意。这里的“三危”者，清代孙星衍说法“在甘肃岷山之西南”比较确切。意为岷山山脉有三座高峻的大山，意即“三危”之所出。岷山山脉之西南方位正好在宕昌的岷山山脉之中。这里的岷山山脉中确实有数处高峰，最鲜目的当属岷山山脉中的雷古山，海拔 4154 米；马鬃岗梁，海拔 4143 米；岷迭山主峰，海拔 4920 米，唯此三峰海拔出众，欲揽群山皆小，史书中描述的岷山山系中的营盘山，虽有遮日之高，但它的海拔也只有 3668 米；白日拉吉山有挡云之功，但它的海拔也只有 3905 米，其它山峰均为 3000 米左右，访寻宕昌境内之岷山，遍踏诸峰，群峰中只有雷古山、马鬃岗梁、岷迭山峰三峰最高，这才是真正的“三危”之所在。而这三危地处

宕昌与舟曲县交界处,西南岷山山谷之中,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少数民族在那里生活着。“三危”只不过是窜三苗的一个标志性象征,只有这里,古代林木森森,地形十分复杂,道路十分闭塞,条件十分恶劣,即使是“窜”,就带有流放、惩罚性质,不投放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还能投放到那里?估计这些三苗之君和上层集团散落于宕昌边远山林地带和紧靠雷古山的舟曲县峰迭乡一带,西至迭部县的山谷中间,仅仅是一少部分。虽为一少部分,但宕昌羌人中自当有苗人的血统。这是历史,这是事实,确不能排外,但不能含盖,“盖出于三苗”,史书说得有些太绝对。

宕昌羌人葬俗

宕昌为古雍州之城,天文井鬼分野。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秦汉时期,宕昌县的城关镇地区,哈达铺地区,沙湾地区,南阳地区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随着农牧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羌人生活水平相应地提高,丧葬文化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理念。8000年到1万年前,这里的土著居民在丧葬文化上一般采取的是将尸抛野的葬法。这时候农牧业没有形成,族人们一般以采集、狩猎的维生,以群聚生活为主,以洞穴为定居地。人死后,不管在山林,还是草山草川,既不掘坑,也不做棺木,在流迁的路途中,抛尸于野,其上覆以树枝即可,让其自生自灭自腐,或走兽飞禽食之。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有了一定的定居处所和农耕生产,人死后不再抛尸于野,一般都要先烧后埋,掘穴封